

脚印 履痕 足音

刘叙杰 著
《建筑创作》杂志社 承编

建筑名家文库

建筑名家文库

脚印 履痕 足音

刘叙杰 著

《建筑创作》杂志社 承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脚印·履痕·足音/刘叙杰著.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9.10
(建筑名家文库)
ISBN 978-7-5618-2963-9

I. ①脚… II. ①刘… III. ①刘敦桢 (1897~1968)
—生平事迹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7081号

策划编辑 金磊 韩振平
责任编辑 韩振平
版式设计 路伟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网 址 www.tjup.com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88mm×265mm
印 张 17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
定 价 66.00元

建筑名家文库系列丛书编委会

顾问：单霁翔 吴良镛 王世襄 谢辰生 罗哲文 傅熹年 马国馨
彭一刚 周治良 楼庆西 杨永生 刘叙杰 张锦秋 程泰宁

主任：朱小地

副主任：张宇 崔恺 和红星 邵韦平

编委：王其亨 王贵祥 孟建民 庄惟敏 胡越 赵元超 周恺
朱文一 王建国 曾坚 李秉奇 金磊 殷力欣 杨欢
韩振平 王志勇 徐峰 李沉 周学鹰

主编：金磊

本卷著者：刘叙杰

本卷执行主编：殷力欣

执行编辑：路伟

图片资料提供：刘叙杰 殷力欣 莫涛 《建筑创作》图片资料中心

美术编辑：路伟

目录

创业脚印	5
建筑大师刘敦桢先生不朽的奋斗历程	
故迹履痕	45
中央文物局山西古建考察团纪行	
回荡足音	141
一段难忘的怀念与追忆	
编校后记/殷力欣	266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八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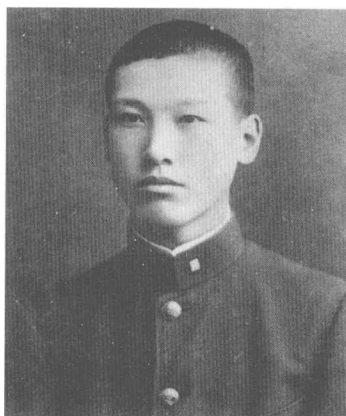
创业脚印

建筑大师刘敦桢先生不朽的奋斗历程

编者按：刘敦桢(1897年—1968年)是我国杰出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建筑教育事业和古代建筑研究工作，是我国中等和高等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培养了一大批建筑设计及科研人才，并奠定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基础。

1987年南京工学院纪念刘敦桢先生诞辰90周年时，《建设报》特约刘先生的哲嗣、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刘叙杰撰写了《创业者的脚印——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于1987年11月3日—12月22日在该报“长城”副刊上连载。此次汇编为本书第一部分之际，作者又对此文的内容作了若干补充与修订。

1897年9月19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父亲诞生于湖南新宁东门外曹家码头后街的老家中。这个靠近广西边界的偏僻小县，青山环抱，绿水萦回，而刘氏宗族是当地著名的大姓之一。依族谱所载，它的始祖在明末天下大乱时由江西迁来，在这里披荆斩棘，创家立业。200余年间，逐渐发展成为宗脉繁茂、人户众多的望族。特别是经过清末那次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争，族人先



刘敦桢先生于1919年
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留影

后投效湘军并取得功名顶戴的，为数相当不少。其中还出现了像封疆大吏刘坤一、刘长祐那样著名的人物。这样，就使得刘姓在县中形成了宅祠相望、邑人刮目的特殊地位。但是，父亲所属的这一房，在整个家族中只算是旁支弱系，其政治、经济势力既不显赫，丁口也不很兴旺。我的曾祖父曾官至知府，中年不幸在四川任上去世。祖父当时年幼，后来虽靠苦读中试，然而已经是清王朝的强弩之末，只做了一任江苏东台知县就挂冠回家了。祖母李氏出身于县内另一大族，是一位典型的三从四德封建女性，生有三个儿子，父亲是其中最小的。

湖南省历来对外比较闭塞，特别是湘西、湘南一带的山区州县，封建保守的气息较之他处更为浓厚。由于我家多代都是科举官宦出身，所以对子弟也赋以同样期望。为此，父亲从四岁起就随着两位兄长受教于家馆，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一直读到《四书》、《五经》。由于他专心用功，虽然大多靠囫圇吞枣式的强记硬背，但他因此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文史知识，并培养了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这些对他日后的研究与学术成就都有很大的帮助。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之战，帝国主义恣意侵略与奴役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而清政府从开始时的无端狂妄自大，一变而为后来对列强的卑躬屈膝，签订了许多辱国丧权与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国内民情为此激昂愤慨，纷纷要求对腐败落后的现状进行变革。然而，李鸿章、张之洞等朝廷大员推行的“洋务运动”，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物提倡的“立宪变法”都遭到失败，这就使孙中山先生等有志之士认识到：必须进行彻底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民主革命，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出路。父亲的大哥是位思想进步的青年，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并积极地参与了革命前的秘密工作。1909年，为了使两个弟弟也能摆脱旧环境的束缚和接受新思潮的影响，他带领他们来到长沙进学堂读书。从一个十分闭塞的山区进入这省内最开放的首府，对父亲来说是大开眼界，也是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一直到后来很久，父亲还多次提起了这件事，并由衷地感谢他那早逝的长兄。

父亲在长沙先后进入了当时颇有名气的楚怡小学和楚怡工业学校，学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与社会思想，并和大家在1911年10月共同迎来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但是后来他没有像大伯

父那样到各地继续奔走，唤起民众，也未和二伯父一道去保定军校投笔从戎，而是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最适合于自己的科学救国道路。1913年9月，他以优良的成绩取得了官费留学的资格东渡扶桑，从此开始了另一种新的学习与生活。先后前往的，还有日后成为知己的柳士英先生。

初到异国他乡，由于语言文字与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不适应，曾给他这16岁的少年以许多困难和烦恼。但是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使他很快就克服了重重障碍，并名列前茅。加以参加了长跑和游泳等多项体育运动，使他原来像“豆芽”那样纤弱的身体变得强壮起来，长期一直折磨着他的胃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16年4月，父亲考取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机械科（即机械系），这是一所直到现在仍然十分著名的日本高等学府（现改称东京工业大学）。由于发现学建筑对自己更有吸引力，父亲于第二年转到了建筑科，而这个转变，对他的一生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大学的几年间，父亲不但在各门课程的学习中都保持着优良成绩，同时也是游泳、田径和足球场上的健将。这个巨大的变化，不但使他的中国旧友，也使他的日本同学都感到惊讶和佩服。可惜的是，那些表彰他学习和运动成绩的奖状奖章以及学生时代的留影，在后来多年的动乱中已荡然无存了。

日本的传统文化，是整个灿烂东方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许多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特点，但其若干内容则渊源于有更远历史的古代中国，其古代建筑自然也不例外。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很注意保护古迹，所以至今还有不少早期建筑保存完好。父亲在课程学习和旅行参观中有机会看到这些，很为它们的宏丽外观与巧妙结构而赞叹不已。联想到更为丰富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当时只有日本和德、法诸国的少数学者，如伊东忠太、波希曼、伯希和等作过一些考察和研究，而国内学界于此反而寂寞无闻。这种反常的现象使父亲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深感惭愧与痛苦，但也促使他树立了日后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志向与决心。

1921年3月父亲获得了东京高工的毕业证书，随即到池田先生所在的建筑士事务所，进行了9个月的见习工作。这一阶段的实际锻炼，给他增添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对日后的独立工作帮助很大。次年春天，在谢绝了池田先生提出的长期居留日本并继续工作的建议之后，就买舟返回上海，结束了长达9年的旅日生活。归国后，先受聘于上海



1920年刘敦桢先生于日本某地海滨



刘敦桢设计湖南大学教学大楼及局部

绢丝纺织公司任建筑工程师，承担了该公司所属的若干工业厂房与生活建筑的设计任务。不久，又与同学柳士英先生参加了创建第一所完全由国人运作的华海建筑师事务所的工作。1923年8月，他与柳士英、朱士圭、黄祖森诸先生共同创办了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这是模仿日本学制，在中国建筑教育中建立的第一个专科性质的学校，为当时社会之急需，培养了许多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骨干。

1925年6月，父亲回到长沙，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任教授。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设计了校内的两座教学大楼以及城内的古建筑天心阁和一些机关的办公建筑。约莫在这年的秋天，经堂叔刘弘度先生(后为武汉大学文学院长、著名中国古典文学教授)介绍，认识了当时在湖南大学就学的陈敬女士，也就是我的母亲，随即于次年订立了婚约。母亲的家庭也是省城中著名的望族之一，外曾祖父是位精明干练的企业家，曾于清末弃官从商，先开过矿，修过铁路，后来以创办长沙电灯公司成功而成为名噪省内的头等实业人物。他除了在生产中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工业技术以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加入了許多西方内容，又延请了外国教师教习子弟，并把长子(我的外祖父)和次子送往美国及日本留学。这在民国初年保守思想还占有很大势力的长沙，的确是件很不简单的事。因此，我的外祖父就成为清华学堂第一批赴美学习的留学生，在宾州大学专攻经济学，先后在国外考察与生活了十余年，返国后在湖南大学执教。他一共有子女9人，母亲居长，最小的舅舅比我还小一点。

父亲回忆起当时到外祖父家初次赴宴的情景是很有趣的。那是一座位于长沙教育坪附近的大宅邸，从大门到宴客的厅堂要走过好几重庭院。那天赴宴的除了母亲的直系亲属外，还来了许多堂、表的伯、叔、姑、姨、舅以及他(她)们的配偶和子女，足足有100多人。大家把未来的大姑爷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为了仔细看一看这位娇客的模样，挤不进来的就站在凳子上张望，同时也进行着七嘴八舌的问候和祝贺(当然还有私下的评头论足)，使初次到来的客人穷于应付与无所适从。这个事先未曾料到的“人海战术”如此声势浩大，给父亲留下了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他在许多年后向我们子女讲述这段经历时，还感到有些“心有余悸”哩！

1926年秋，父亲又回到苏州，继续在苏州工业学校建筑科执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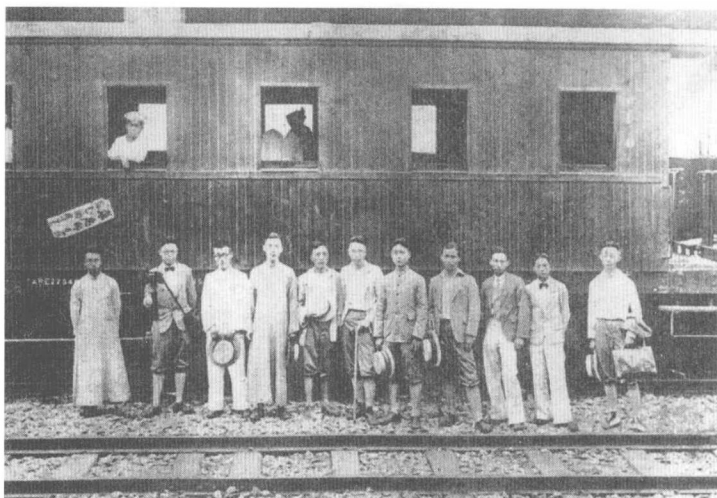
次年年底，苏州工专建筑科奉命迁往南京，并入江苏大学工学院，旋改第四中山大学，最后定称为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这是我国大学教育中正式设置建筑学专业的伊始。这一专业的设立，不但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而且还对当时社会的生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帝国主义仍然在许多方面控制着中国的要害与命脉。例如那时的一些主要新型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全部为外国洋行所垄断。其中除了有政治上的因素以外，国人未能掌握先进的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后来有一些自日、美、英、德等国攻读建筑学归来的留学生，但数量上仍然远远不敷建设需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发展，也要求在各门科技中有中国人自己的队伍。因此像苏州工专那样的技术学校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求，而培养更多的和更高级的建筑人才，就成为社会赋予中国新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1930年与中央大学师生合影
(前排右4为刘敦桢)

那时去南京的除苏州工专建筑科的全体学生外，还有少数应聘教师，父亲即其中之一。参与创建与筹划这一新系事务的，除父亲和首任系主任刘福泰先生外，还有李祖鸿先生。他们都先后留学美、英等国，因此对建筑系在我国应有之学制、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等，均有许多不同意见。经过反复对比国内外情况和讨论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与实际可能后，将建筑系定为：学制四年，实施学年与学分制；培养目标以建筑设计为主，但需具有必要的各项工程与技术的基础知识以及良好的对建筑美学的欣赏与表现能力；着重培养学生正确与全面处理实际问题的技能；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除必修课程外，另增若干选修课等原则。

率中大建筑系学生
北上测绘古建筑，摄于浦口车站



由于这时建筑系刚刚成立，其教学制度与教学内容均在试行阶段，系中师资与图书设备都很缺乏。为了弥补这些不足，除了由学校努力招聘人才、增添书刊与教具外，还鼓励教师在教好本门课程时，尽可能多兼授其他科目。这个额外的要求使育人者倍加辛苦并增加了实施的难度，许多教师认为难以接受。而父亲为了教学上的需要，曾先后担任过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史、中国营造法、西方建设史、建筑营造法、阴影透视、建筑测量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等课程。通过这些实践，不但解决了当时系中师资缺乏的燃眉之急，对授课教师同样也是一次很好的深入学习与全面提高。教师在了解多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后，就有可能全面协调各门课程的分量与比重以及其间的内在相互联系，并可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予以综合解决。父亲对这样的教学甚为赞同。无论对当时的教学实践或多年后担任系主任、院长的行政工作，这都使他得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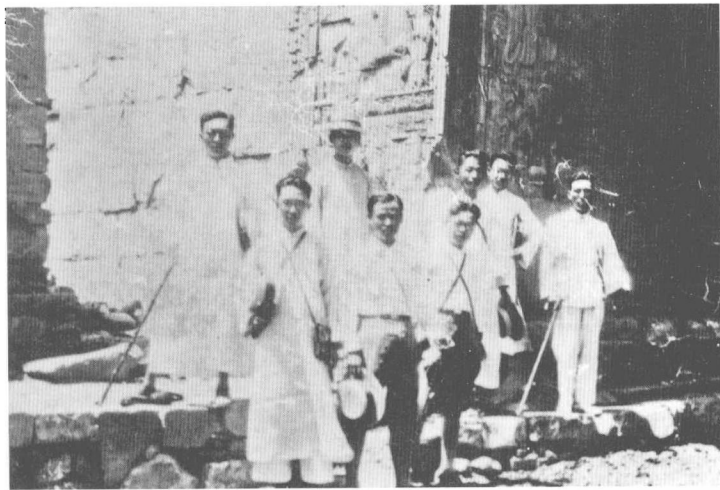
此外，他对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很重视。除了在日常教学中加强这方面的训练，父亲还亲自带领学生到各地实习参观。如1930年就曾率助教濮济材、32级与33级的学生辜其一（后任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已故）、杨大金、戴志昂（后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已故）、张镛森（后为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已故）等北上，到山东曲阜孔庙和故都北平的宫殿、庙宇及其附近的颐和园、香山、明十三陵、居庸关等处参观古迹，并作了测绘和摄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这也是国内学术单位对自己的传统古建筑所进行的最早的一次集体科学考察活动。

中大建筑系开始招生不多，有的班级只有两名学生，最多的亦不超过10人(已招若干女生)。这是因为建筑系中的某些课程(如建筑设计、素描等)只能用个别辅导而不能靠上大课的方式。因此，在教师严重缺员的情况下，学生的招收人数也必然受到限制。虽然早期系内毕业的学生不多，但他(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则不容低估，有的至今还在祖国各地担任着建设中的重任，成为生产、教学、科研等工作里的中流砥柱。例如许道谦(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张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曾子泉(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唐璞(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系主任)、林宣(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张开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王惠英(南京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建筑系教授)、孙增蕃(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何立蒸(西南军区营房部高级工程师)等。

除了繁忙的教学工作和建筑师事务所中的设计工程以外，父亲的业余时间大多用于阅读历史文献与踏访古建筑遗址，但在周末却又常常搭乘京沪铁路的夜车赶到上海，第二天踢一场足球或观看比赛，晚上再乘车返回南京。一个单身汉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据杨廷宝伯父的回忆：“我第一次拜访士能(父亲的号)兄是在1929年，那时他住在中大附近的大石桥，独自租了一间房屋。我去时他正伏在桌上绘图，桌上、床上和地上都堆了不少书籍，还有一些收集来的秦砖汉瓦以及穿着的衣物零散地放着。我们就在这不太整齐的小屋里畅谈了一个下午，相互感到很默契，从此开始了数十年不渝的深厚友谊。”这番话是1980年间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言犹在耳，可是杨老离开我



北上测绘途中，摄于胶济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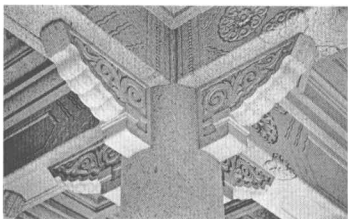
1930年夏率中大部分师生
考察居庸关长城



刘敦桢先生与家人合影（1931年阴历十二月初四刘叙杰出生一百天，摄于金陵唱经楼西街）



刘敦桢设计中山陵光化亭



刘敦桢设计中山陵光化亭局部

们快五年了。联想到父亲生前的知交旧友，如梁思成、林徽因、童寓、赵深、哈雄文、吴有训、童第周、贺昌群、曾昭燏、柳士英等先辈，以及海外的李济、董作宾诸先生，至今都已不在人世，而他（她）们的音容谈笑依旧萦系眼前，仿佛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思之不禁愀然。

父亲是在1930年结束了他的独身生活的。那年冬天他来到长沙结婚。由于曾外祖父的思想开明，婚礼的地点安排在青年会而不是在家里，新人对长辈也只好鞠躬礼而不叩头，这些“超越常规”的做法在当时大部守旧的亲友中自然会引来某些非议。根据日后保存的照片来看，新人的礼服也是中西合璧的，母亲着西式衣裙披长纱，而父亲则穿戴上传统的长袍马褂。结婚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和前一天的狂风暴雨截然不同。有人开玩笑说是新姑爷打点了气象台的关节，才预订了这样的好天气。

婚后不久，父母亲就一同回到南京，在鼓楼附近的唱经楼后街租赁了一个小院，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一年以后，我就在这里呱呱坠地了。

父亲在1922年归国后，就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先是广泛查阅中外有关的文史资料，并利用假日陆续考察沪、宁、杭一带的古建筑和遗址。后来在各方面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开始写作论文。192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首篇著作《佛教对中国建筑之影响》。1931年又写出了对两篇日本译文《法隆寺与汉、六朝式样之关系》与《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的补注。此外，还在南京中山陵前设计了一座全由石构的光化亭，作为对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研究的又一次实践。这些工作，都引起了远在北平的朱启铃先生的注意。这位在北洋政府中曾经屡居要职的耆老，一直热心于研究与整理华夏建筑的国故，并于1929年在故都北平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以下简称学社）。他除了不断向各界宣传呼吁并努力筹募研究经费外，还积极邀请社会知名人士与中外有关学者参加。梁思成、林徽因、陈植等先辈和父亲都是在那时先后加入了这个由私人发起和组织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国内唯一学术团体。

由于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极有限，要想在中国古建筑这门学科中作出重大突破，就必须全力以赴，并且在某些方面付出相当的代价与牺牲。为此，父亲在同母亲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后，毅然辞去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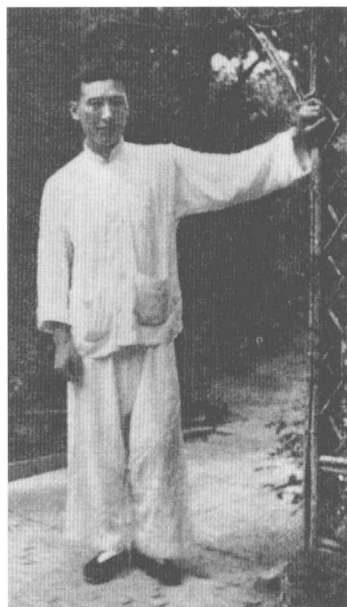
央大学的教学工作和与卢树森先生合组的宁海建筑师事务所收入较丰的兼职，于1932年秋迁居北平，在营造学社专心矢志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就这样，父亲在决定自己的未来事业与命运前途上，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从这时起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不到五年间，对于前来营造学社进行正式科研工作的父亲，是一生中极可纪念的重要时期。在老社长朱启铃先生的具体领导与关心下，担任文献主任的父亲与担任法式主任的梁思成密切合作，改变了过去国内史界研究中国古建筑单纯依靠在案头考证文献的片面方法，而是亲自带领青年助手，或分散、或集中，前往各地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测量、绘图、摄影等科学技术手段，详细记录了被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及其重要数据。返回后再进行全面整理，绘出正式图纸，并通过已知实例与文献、历史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和论证，最后写出调研报告。这个工作程序现在看起来极为普通，似乎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却使这门学科的研究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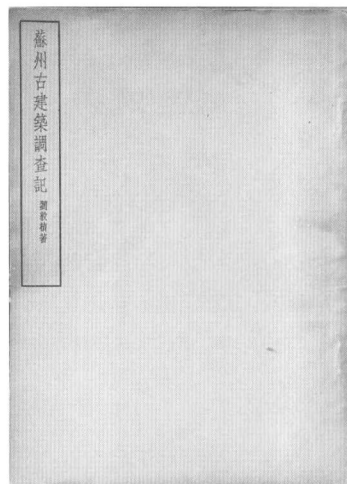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以前的国内社会经济条件与交通运输状况自然都不能和今日相比。特别是那些十分偏僻的山村野处，不但经济、文化落后，旅行也不安全，而且多半要乘骡马、坐大车甚至步行才能到达。科学家的野外调查不是轻松的郊游野餐，而是辛苦而紧张的劳动，也是对参与者的身体、意志和专业技能以及思想品德的全面考验。

经常是在长途旅行与劳顿之后，甫卸行装，就要马上赶赴现场并开展紧张的考察工作。为了取得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必须钻进灰尘厚积的屋架，或攀登年久失修的屋顶，那些糟朽不堪的梁柱或松散滑动的砖石，都可能给探索者带来致命的危险。而茂草丛生的废墟与久荒无人的洞穴，从中突然窜出的蛇虫蝙蝠，也常会给大家以意外的惊恐。至于风吹日晒、雨打霜侵、攀山涉水、朝出暮归等就更不必说了。

然而一切工作中的困难和生活上的不便，却没能阻挡开拓者前进的脚步。父亲和学社成员们就是这样地无视艰苦，从一个古迹或遗址转到另外一个，几乎踏遍了北国的山河大地。沐浴着大自然的烈日寒风，使他既显得风尘仆仆而又精神抖擞。特别是长期辛勤的田野工作，带回来前所未有的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更是令人振奋不已。作



1935年于苏州



刘敦桢作于此时期的著作
《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书影